

论东亚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中國]陈汝东**

目 录

- 一. 东亚的修辞学传统
- 二. 东亚修辞实践的新态势与新挑战
- 三. 东亚修辞学发展的公共修辞学态势

在东亚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伴随着相互间的文化借鉴与融合，也始终搀杂着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与借鉴。东亚的修辞实践及修辞学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中日韩三国的修辞实践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的传统；另一方面，中日韩三国的修辞学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同时也在不断与西方的修辞学形成碰撞与借鉴。这种趋势自从日本明治时代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中期以后越发明显。近年来，随着政治、经济等全球化情势的发展，东亚三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热情高涨，其修辞实践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手机、网络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迅速，公众信息传播权利的实施空间大大拓展，公众信息传播的需求持续增长。东亚三国的修辞学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其国际学术地位逐步提高，交流空间不断拓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但是，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东亚修辞学如何适应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如何在保持和发扬区域学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更好地融入国际修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chenrd@pku.edu.cn

** 本文为韩国修辞学会第二届国际会议特邀大会报告（韩国首尔大学·2010年10月23日），发表时有删节。

辞学发展的洪流，成为东亚修辞学学者亟需考虑的课题之一。为此，本文旨在简要梳理东亚修辞实践及其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分析、概括近年来东亚特别是中国修辞实践形态中出现的新现象、新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并阐释全球化和新媒介环境下东亚修辞学发展的公共修辞学方向与趋势。

一. 东亚的修辞学传统

1.1 东亚的修辞学传统

在人类修辞及其研究的发展历程中，东亚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修辞及修辞学，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中国的修辞思想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典型的是孔子所说的“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¹⁾ 后世直到20世纪初年，中国修辞论多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作中，比如王充的《论衡》、刘向的《说苑·善说》、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序》、陈骥的《文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等，且研究对象和范围集中在书面语修辞，特别是诗文写作修辞。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修辞学诞生，至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词语修辞、修辞格、文体风格为主的理论体系，代表作主要有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龙伯纯的《文字发凡》、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论》、唐钺的《修辞格》、陈介白的《修辞学》和《新著修辞学》、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以及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50-60年代，中国修辞学理论体系趋于成熟，先后出现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著作。这一时期的中国修辞学，完善了由语音修辞、词语修辞、句式修辞、修辞格、语体风格等构成的理论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修辞学的

1) 《周易·乾·文言》。

研究对象向语境系统等方面发展,涌现出许多修辞学著作,比如倪宝元的《修辞学》、王德春和陈晨的《现代修辞学》、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以及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逐渐扩大到修辞的社会心理机制、认知机制,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陈汝东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认知修辞学》、《当代汉语修辞学》等。这些研究成果,探讨的主要是书面语修辞,尽管它们并不特别区分口语修辞和书面语修辞,但并不探讨演讲或演说修辞。

日本修辞学开始于何时目前缺乏统一的认识。奈良时代空海所编的《文镜秘府论》,通常被认为是日本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不过,该书主要是中国自六朝至中唐前期的诗文论。有的认为在1950年之前,日本不存在劝服意义上的修辞学,这种意义上的修辞学是指积极的表达艺术。²⁾ 日本修辞学在词面上有“修辞学”、“文章学”、“美辞学”、“雄辩学”以及用片假名表示的“レトリック”等多种形式。日本的“修辞”一词来源于中国《易经》中孔子的话,“美辞”则来源于中国三国时期曹植《辩道论》中的“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³⁾ “美辞学”则是“Rhetoric”的意译,是“修辞学”的旧称。19世纪70年代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日本修辞学主要以文章做法、修辞格、论辩、美文等为研究对象。其修辞研究立意重在文章的内涵、结构、类型、文体、风格以及修辞手法、修辞技巧。这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研究文章或称作文法的,比如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1905. 6)、《新文章讲话》(1909. 10)、加藤熊一郎(咄堂)的《应用修辞学:演说文章》(1923. 5)、芳贺矢一和杉谷代水的《作文讲话及文范》(1928. 10)等。二是研究美辞的,也就是修辞的。比如高田早苗的《美辞学》(1889. 5)、坪内逍遥的《修辞学》、《美辞学》(1893?)、《美辞论稿》、《美辞论》等。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18--?)、《新美辞学》

2) Massimiliano Tomasi, *Rhetoric in Modern Japan: Western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and Oratorical Sty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4, p. 27.

3) 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藏版1916年3月,第2、3页。

(1916. 3) 等。第三种是以“修辞”为名的, 比如五十岚力的《常识修辞学: 作文应用》(1909. 10)、《修辞学大要》、《修辞学纲要》、《修辞学讲话》, 大和田建树的《修辞学》(1893. 1)、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1898. 9)、佐々政一编的《修辞法》(1901. 4)、服部元彦的《修辞学》(18--)、渡边吉治的《现代修辞法要》(1928. 9) 等等。第四种是研究论辩的, 比如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1882)、尾崎行雄译的《公会演说法》(1877)、中江兆民译的《维氏美学》(1883)、马场辰猪的《雄辩法》(1885. 8)、雄辩学会编的《雄辩学讲话》(1924. 11)、竹内尉编的《模範卓上演説とその分类的新研究》(《模範即席演说及其分类的新研究》, 1926. 2)、安部矶雄《雄辩学讲座》(上中下卷, 1928. 1) 等。这些著作主要阐述了演说的定义、类别以及各种修辞格和话语风格。明治后到20世纪中叶以后, 日本的修辞学研究逐渐转向了文体学和外国修辞学, 主要著述集中在修辞学史方面, 比如速水博司的《近代日本修辞学史: 西洋修辞学の導入から挫折まで》(《近代日本修辞学: 西方修辞学的引入和挫折》, 1988. 9)、原子朗的《日本修辞学の史的研究》(《日本修辞学史研究》, 1994)、速水博司的《レトリックの歴史: 近代日本》(《修辞学史——近代日本》, 1995. 5)、有沢俊太郎的《明治前中期における日本のレトリックの展開過程に関する研究》(《关于日本明治时代前中期的修辞学发展过程研究》, 1998. 1) 等, 但是没有出现明治时代那样的繁荣景象。⁴⁾

韩国的修辞学研究深受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影响。在韩国, 现代意义上的“修辞”(susa) 一词通常被认为是启蒙或开放时代(1876-1910) 源自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⁵⁾ 但是, 韩国受中国修辞文化的影响至少可以追溯

4) Ru-dong Chen, “Rhetoric in East Asia: China and Japa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Wolfgang Donsbac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8. 5; 胡成花、陈汝东《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 《修辞学习》2008年第5期, 第65-70页。

5) JON Sung Gi, “Towards a Rhetoric of Communic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Korean Rhetoric”, *Rhetoric*, Vol. 28, No. 3, 2010, p. 316.

到汉代。20世纪中叶之前，韩国的修辞学研究以吸收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为主，所探讨的基本是文章写作修辞，比如安国善的《演说方法》（1907）、崔在学的《实地应用作文法》（1909）、李泰俊的《文章讲话》（1940）、金起林的《文章论新讲》（1950）等。⁶⁾ 韩国现代意义上的修辞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除了继续吸收借鉴东西方修辞学的研究成果外，近年来部分韩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的修辞理论观点，比如田圣淇所提出的“修辞传播”、“波修辞”以及罗敏球所提出的关于韩国汉语修辞学的一些理论观点等等。2000年后建立的韩国修辞学会，为韩国修辞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修辞学的发展中，除了受中日修辞学传统影响，重视研究文章写作修辞之外，也很重视与大众传播实践的结合，强调了对说服和公共演讲修辞的研究，比如朴禹洙对现代韩国演说修辞史的研究。⁷⁾

东亚修辞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 (1) 对修辞的定义多着眼于“修饰”、“调整”、“调适”、“美化”、“技巧”等。
- (2) 以书面语修辞、文章写作修辞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在探讨文章的结构、类型、文体或语体、风格、语境以及写作修辞的手段、方法，包括语音修辞、词汇修辞、句式修辞、修辞格等。
- (3) 不重视公共修辞，多以个体修辞为主，着眼于社会个体利益，特别是社会个体的安身立命，即使最终功能指向国家等公共利益，也是主张通过个体修辞行为实现。
- (4) 以语言、语文为学科建制，修辞学多归入语言学、语文学，而不是像西方修辞学那样归入哲学、伦理学或者成为独立的学科。

1.2 东亚的修辞实践传统

东亚的修辞学传统是建立在其修辞实践基础上的，它与东亚三国的政治、

6) 罗敏球《浅述韩国传统修辞学的发展历程》，2009年北京大学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北京大学，2009年6月7日。

7) 朴禹洙《代笔韩国：罗伯特·奥利弗及其修辞在韩国建立中的助推作用》，2009年北京大学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北京大学，2009年6月7日。

历史、文化具有必然联系，与它们共同的文化渊源密不可分。首先，东亚特别是中日韩三国都属于汉字文化圈，受共同的儒家文化思想影响。因此，重视“质”、“行”，强调“德”胜于“言”、“行”胜于“言”，⁸⁾体现在修辞学研究中，就是重视写作，不重视公共言说，在中国、日本、韩国的古代历史上，很少出现公共演说修辞。⁹⁾比如罗敏球就认为：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民众更倾向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或者说“眉目传情”、“以心交心”，而不是激昂慷慨的演说，“沉默”在韩国也是一种沟通协商手段。¹⁰⁾其次，东亚三国的大部分历史是集权式政治制度，只是到了现代才实行有限的民主式公共权力建构体制。“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¹¹⁾与中国相似，古代、近代日本、韩国的社会制度也大致如此，因此，也不会产生公共演说修辞，更不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公共修辞学。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时有演讲、论辩或说服的多种形态，但是，都有别于古希腊传统上的公共演讲修辞，因为它“解决的只是集权社会中的权势主体决策问题，或者公共行为的统一问题，并非公共意志的凝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事务的决策问题，尽管其结果也都涉及公共利益，但其出发点并非着

8) 陈汝东《孔子言语行为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124-127页；戴磊、陈汝东《论孔子的修辞学思想》，《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12-15页。

9) Massimiliano Tomasi, *Rhetoric in Modern Japan: Western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and Oratorical Styl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4, p. 27.

10) 罗敏球《浅述韩国传统修辞学的发展历程》，2009年北京国际修辞传播学前沿论坛，北京大学，2009年6月7日。

11) 陈汝东、胡成花《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修辞学习》2008年第5期，第65-70页。

眼于公共利益。参与的主体、信息的性质、传播的过程、传播的效果以及传播的机制都是不同的。”¹²⁾ 在现当代, 演讲虽然被纳入修辞学的研究范畴, 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为中国缺少这方面的社会基础。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日本和韩国, 情况也大致如此。日本修辞学在明治时代借鉴了西方修辞学中的演说修辞研究传统, 引进了许多公共演说修辞学的著作, 公共演说在明治时代初期和后期也只是昙花一现。明治之后, 日本的修辞学研究基本上又回到了书面语修辞。

二. 东亚修辞实践的新态势与新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网络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全球化态势的加剧, 东亚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修辞实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公共修辞正在兴起。这为东亚修辞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 也使东亚修辞学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2.1 东亚修辞实践的新态势

随着全球化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中日韩三国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融入国际新秩序的程度也在加深。无论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 还是公民社会生活,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其修辞实践也正在发生一场变革, 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公共修辞形态, 呈现出新的修辞态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 (1) 新媒体修辞环境。自从20世纪末期以来, 国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使东亚三国的修辞实践出现了新的媒介平台。目前随着电信网、

12) 陈汝东《论人类传播秩序——一种比较修辞学视角》, 《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 关世杰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575-585页。

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等三大网络的逐渐融合，以及3G时代的到来，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的多媒介修辞时代已经到来。这为公共修辞空间的建构奠定了物质基础。新媒介大大突破了传统媒介修辞的时空限制，使跨越空间的全天候修辞成为可能。任何修辞主体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互动。网络身份虚拟，消弭了既有修辞中的诸多限制。在中国，各种私营网络媒体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党有、国有媒体的垄断局面，使自由意志的抒发成为可能。这些都为公共修辞的发展创造了技术空间。

- (2) 空前的公共修辞群体。随着网络的普及，在中国，网民的数量激增，这为公共修辞时代的到来奠定了主体基础。据统计，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4.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持续上升至31.8%。手机网民达到2.77亿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到2.65亿。¹³⁾ 随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的融合，公共修辞群体还将进一步扩大。有资料显示，截止至2009年8月份，日本的3G用户数已达1.036亿，3G渗透率已达94.8%，大大超过了欧美的普及水平。¹⁴⁾ 韩国也是全球移动互联网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据韩国放送通讯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网络利用状况调查》和《无线网络振兴综合计划》显示，至2010年5月，韩国网民规模达到3701万人；到2010年3月，韩国移动网民规模为1514000人，目前利用手机人口中使用移动网络服务的比例为3.1%。网民中使用移动网络服务的比例为约4.09%。¹⁵⁾ 尽管三国的网络管理制度不同，网民群体也未必全部参与公共修辞，但是，他们至少不再是纯粹的个体修辞群体，而将成为潜在的或可能的公共修辞群体。
- (3) 高涨的公共修辞热情。最近10年来，互联网的发展为网民参与公共事

13) 《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年7月15日。

14) 柳贺《日本3G与移动互联网发展现状与趋势》，《上海情报服务平台》2009年12月25日。

15) 韩国放送通讯委员会《2010年网络利用状况调查》，参见www.kcc.go.kr；韩国放送通讯委员会《无线网络振兴综合计划》，参见www.kcc.go.kr。

务决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参与公共修辞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不断增加。比如，中国网民的修辞情状，逐渐由自我的情感、情绪、思想和意志的个性表达向公共意志表达发展。回顾中国现代修辞形态的历程，大致可归纳为两次大的变革：一次是由集权式革命修辞到改革开放后的个性修辞，这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第二次是由改革开放后的个性化修辞向网络空间中的公共修辞转变，这是中国修辞形态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的飞跃。目前，中国网民通过网络自由表达他们对公共政策、公共事务的看法，使修辞的公共政治功能得到加强，这种发展态势近年来越发强劲。这样的状况在日本和韩国也是同样的。

- (4) 逐渐丰富的公共修辞形态和初显的公共修辞效果。目前东亚三国的公共修辞，多不同于古希腊传统上的公共演说修辞，而是网络公共修辞，且呈现出多种形态，比如各种网络媒体的新闻栏目、公共讨论区、博客、微博以及个人网站、网页等等。除了语言修辞之外，还有图片、视频等多媒介形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前的公共修辞形态，并没有被秩序化特别是法制化，多处于自发的无序状态，它主要以形成舆情热点为功能发生方式。公共意志的体现和凝聚，多处于自发的无序状态。尽管公众可以通过个人意志表达的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修正，但是，这种影响还是以公共政策制定机构的自律为前提的，比如北京市的机动车限行、燃油等资源消费价格的调整等等。中国网络公共修辞的兴起，对中国的公共政策、公共事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塑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而且为公共政策的执行、监督、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保障和维护了许多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公正性。目前已由许多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事务的处理，因公共修辞的参与而向公共意志倾斜，比如《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公布）的颁布、2010年7月公安部施行三级以上拘留所向社会开放政策的施行等，都与公共修辞的介入具有密切关系。

韩国和日本的公共修辞形态及其发展程度与中国有所不同。自二战后，韩日两国都受到了美国公共修辞传统不同程度的影响，先后出现了富有各自特点的公共修辞形态，但是，公共演讲修辞多停留在政治选举层面。网络普及之后，因韩日两国对网络的管制比较严，近似于实名制，因此，公共修辞的深度、广度和程度与中国的有许多差异，但是都呈现出网络公共修辞的发展态势。两国网民不同程度地通过公共修辞形式参与到了各自国家的公共事务、公共政策领域中。

2.2 东亚修辞实践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虽然东亚三国都出现了有利于公共修辞建构的良好环境，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等原因，目前东亚的公共修辞依然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个体修辞传统亟需转变，公民的公共修辞意识需要继续增强。受重行轻言修辞伦理观念的影响，东亚三国看重个体修辞的传统在当代依然存在。这种观念依然是制约公共演讲修辞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民众在公共权利、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多采取集体沉默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2）缺少公共修辞制度保障。近年来，虽然公共修辞在公共政策、公共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公共修辞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缺失。除了上述的原因外，缺少制度公共修辞的制度和秩序保障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公众参与到了许多公共政策、公共事务领域，但是，在有些领域中公共意志并没有得到有效体现。比如在中国，医疗价格、房产价格的居高不下、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城乡差距较大等。因此，建立公共修辞的政治、法律、行政等制度保障，是公共修辞秩序建设的重要前提。（3）缺乏公共修辞教育传统。因中日韩三国历史上缺少公共演说修辞传统，因此，现在依然延续着重视德行修养、重视个体书面修辞的传统，尽管公共演说修辞教育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既有的个体书面语修辞教育，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除上述方面外，加强公共修辞研究，也是东亚公共修辞发展所必需的。

三. 东亚修辞学发展的公共修辞学态势

近年来,随着东亚修辞实践的发展,包括修辞政治环境民主化进程的深入、公众信息传播自由权利实施空间的拓展和公众信息传播需求的变化以及新媒介技术的普及和传播空间的不断拓展,东亚修辞学研究加速了与国际修辞学的碰撞与融合,且有了长足进展。在中国,修辞学逐渐向诸多的新领域特别是新媒体、新传播领域拓展,出现了宗教修辞学、建筑修辞学、视觉修辞学、传播修辞学、公共修辞学以及修辞学教育等新兴交叉学科。¹⁶⁾韩国、日本的修辞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态势。由语文修辞学向传播修辞学、从平面媒体修辞学走向多媒体修辞学、从民众修辞学走向国家修辞学、由个体修辞学向公共修辞学发展,将成为东亚修辞学发展的未来态势。其中,公共修辞学将成为未来东亚修辞学乃至世界修辞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1 公共修辞的内涵

随着修辞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修辞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修辞不仅是一种选择语音、词语、句式、修辞格等的语言运用现象,也不仅是一种运用语言、音乐、图片、图像、建筑、环境等涉及听觉、视觉、触觉等媒介符号,建构有效的文本,传播信息,以影响、改变他人情感、态度、思想、观念乃至行为的社会现象;它也是一种人类传播现象,是一种人类传播秩序和社会秩序,是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建构、社会事务处理、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和方法,是一种社会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是一种人类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形态。

16) 比如陈汝东的《论修辞研究的传播学视角》、《论修辞的视觉效果》、《论视觉修辞研究》(2005)、《论北京奥运会中的视觉修辞类型、方法和功能》、《论建筑修辞学》、《论汉语宗教修辞》、“On Chinese Religious Rhetoric”(2009)、《论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修辞学教育》、《论公共修辞学的理论建设》(2010)等。

“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而提出的,它源自笔者对东西方修辞实践及修辞学传统的透视与比较。“公共修辞”是相对于“个体修辞”的一个概念。“所谓个体修辞,就是修辞者是社会个体实施的以自身利益为主要指向的修辞行为。个体修辞的功能最终虽然也会产生社会功能,但其出发点重在个人利益。公共修辞则是指社会个体或群体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修辞行为,其修辞动机在于公共意志表达,公共权力建构和公共政策制定。”¹⁷⁾

“公共修辞”和“个体修辞”是人类修辞的两种基本形态,它们既是两种修辞行为和修辞现象样式,也是两种文化传统和文化形态;既是两种社会组织方式,同时也是两种传播秩序和两种社会秩序范式;既是两种社会权力建构模式,也是两种社会制度模式。这两种修辞形态,分别以中日韩三国古代的修辞实践和西方古代特别古希腊和现代欧美的修辞实践为代表。对此我们曾有过论述:“东西方古典修辞及其相关的学术传统差异以及在现代社会的继承和延续,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传播权利赋予、行使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古希腊的公共演讲修辞,以公共民主为基础,建立了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程序,建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中国古代以及现代的修辞实践,反映了中国古代和现代对社会传播秩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模式的选择。”¹⁸⁾

“公共修辞”和“个体修辞”,既是两种历时范畴,同时也是两种共时范畴。它们既是对人类修辞历史形态的抽象,也是对人类现有共时修辞形态的概括。实际上,在现有的修辞形态中,人类不仅需要运用个体修辞,表达个体的生活、情感、情绪、思想、意志,调控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需要运用公共修辞,反映公共意志,解决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关系问题。个体修辞与公共修辞并不能绝对地分开,个体修辞是公共修辞的基础和表现形式,公共修辞是个体修辞在公共领域中的反映。

17) 陈汝东《论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修辞学教育》,《韩中语言文化研究》第22辑,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韩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会编,2010年2月,第3-19页。

18) 陈汝东《论人类传播秩序——一种比较修辞学视角》,《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关世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5-585页。

3.2 公共修辞的源流

在修辞学历史上,给人类的修辞形态加以抽象、分类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方面比较重要的类型化有许多,比如“口语修辞”和“书面语修辞”、“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文艺修辞”与“实用修辞”等等。“口语修辞”和“书面语修辞”是基于语言的自然形态和传播方式。“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的类型化,始于日本明治时代的修辞学家岛村抱月。他在《新美辞学》中把修辞现象区分为“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类,其标准是修辞动机和修辞效果。岛村认为,“消极修辞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人完全理解自己的观点。积极修辞目的是装饰自己的观点用以感动他人。”¹⁹⁾后人又换用“辞规”、“辞格”²⁰⁾或“规范修辞”、“变异修辞”名之。“文艺修辞”与“实用修辞”是根据修辞领域划分的,始于苏联的功能修辞学,是一种语体、风格上的类型化。上述修辞形态的划分,多囿于微观的修辞现象,着力解决的是微观上语言修辞现象自身的结构和功能问题。我们对修辞形态的“个体修辞”和“公共修辞”归纳,立意则在于修辞的宏观社会功能特别是修辞之于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功能。

“公共修辞”作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术语或研究领域,较早见于吴斯诺(Wuthnow R)的论文《作为公共修辞的宗教话语》(1988)、克林沃司(Killingsworth MJ, Steffens D)等的《环境影响报告的有效性:一种公共修辞研究》(1989)。这方面的直接专著主要有芭芭拉·库齐等(Barbara Couture, Thomas Kent)编著的《隐私、公众和出版:隐私生活与公共修辞的统一》(2004)和葛雷格(Greg Barnhisel)的《媒介与信息:公共修辞著作与策略》(2005)等。此外,昆纳(Gunnar Andrén)的《媒介与伦理:群体修辞的理性与自制》(1978),探讨的是群体修辞(mass rhetoric),也可以算做这方面的著作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基本是以西方的公共演说修辞传统为基础的,我们所提出的“公共修辞”与此有较大差异。

19) 岛村泷太郎《新美辞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藏版1916年3月,第2、3、141-142页。

20) 吴士文《建立辞规,完善修辞方式的系统》,《营口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3.3 公共修辞的特点

我们此处所提出的“公共修辞”是与“个体修辞”相对而存在的，它不仅包含了西方古希腊传统上的公共演讲修辞含义，更重要的是包括了以国际互联网等新媒介为技术平台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多媒体修辞形态。“公共修辞”与“个体修辞”的差异表现在修辞主体、修辞指向、修辞信息、修辞功能等方面：首先，两者的修辞主体存在差异。这不仅指数量，而且指信息权利以及相关的修辞形态。公共修辞多以集体或群体形式出现，即参与修辞的主体多不是作为利益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他们拥有平等的言论权利，共同的价值和利益取向，为了共同的公共利益或者说群体利益。比如，在中国近年来的网络修辞领域中，许多网民通过网络表达了对国家政策的意见或建议，参与到公共事务决策中，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调整中，许多公共政策因为网民的公共修辞参与而产生了显著变化，比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被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等等。这种修辞形态就具有公共修辞的特征。而个体修辞的参与者多是个体形式，无论是修辞者，还是受众，且存在信息权利、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必然存在一个权势主体。其次，修辞动机、目的不同。公共修辞的动机是凝聚公共意志，制定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所谓公共意志，并不是一个“意见的大多数”概念，而是能体现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平等权益、能反映社会发展趋势的集体意见集合。个体修辞所要达到的，虽然有时也是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但是其实施方式并非凝聚公共意志，而是为了维护某个或某些特殊利益群体或阶层。再次，信息性质差异。公共修辞的信息必然是公共性的，而非个体性的，即涉及公共政策、公共权益、公共事务。最后，两者的修辞互动方式和功能差异。“公共修辞”是平等的公共意志表达和接受，“个体修辞”则是个体意志的不平等表达和接受，而非公共意志，虽然某些情况下个体修辞也能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事务的处理。

综上所述, 在人类长期的发展历程中, 形成了个体修辞和公共修辞两种基本形态。东亚特别是中日韩三国的修辞和修辞学传统, 基本是以“个体修辞”为主的。以语言学为范畴, 以个体修辞能力培养为理念, 强调书面语诗文修辞, 突出“行胜于言”的修辞伦理思想, 缺少公共演说修辞秩序等, 都是东亚传统修辞、修辞学的特点。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等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剧、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民众自由意志表达权利的实施空间广为拓展。东亚的修辞实践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形态, 东亚修辞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东亚既有的修辞学研究已不能适应其修辞实践发展的新形势, 尽管东亚以个体修辞能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既有修辞学范式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 但它却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下东亚社会发展对公众公共修辞能力所提出的新需要。在全球化和新媒介环境下, 东亚三国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 公共权力建构、公共政策制定、公共事务处理, 正呈现出越来越重视公共意志表达和公共意志体现与凝聚的趋势。公众的公共修辞能力、素养和自觉意识亟待培养、提高。在此形势下, 积极参与国际修辞、国际修辞学的互动与融合, 继承和发扬东亚既有的修辞学学术传统, 加强对网络等新媒介环境下东亚公共修辞新形态的研究, 建构公共修辞新秩序, 促进公共修辞学的发展, 反映了东亚修辞学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方向。公共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将对公共民主权利秩序的建立和维护, 对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监督以及社会公平公正秩序的维护,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 陈汝东《论公共修辞学的理论建设》，世界汉语修辞学会第二届年会暨修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教育学院，2010年7月27-30日；第十一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北京大学，2010年7月9-11日。
- 陈汝东《论公共修辞学——当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中国修辞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海·上海复旦大学，2010年12月3-6日。
- 陈汝东《论北京奥运会中的视觉修辞类型、方法和功能》（合著），《修辞学》（*Susahak*，韩国）2009年9月。
- 陈汝东《新兴修辞传播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 Greg Barnhisel, *Media and Messages: Strategies and Readings in Public Rhetoric*, Pearson Longman, c2005.
-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Patricia Bizzell, Bruce Herzberg, 2nd ed. ,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c2001.
- Killingsworth MJ, Steffens D, "Effectiveness in the Environmental-impact Statement- A Study in Public Rhetoric", *Written Communication*, Vol. 6(2), pp. 155-180, Apr 1989.
- Wuthnow R, "Religious Discourse as Public Rhetor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15(3), pp. 318-338, Jun. 1988.

<Abstract>

On Trends of Rhetoric Studies in Eastern Asia

Chen RuDong

A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especially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he global process of rhetorical communication and its academic studies is being accelerated. In this case, it becomes an academic topic for how to eliminate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rhetorical communications and promote the amalgamation of regional rhetoric studies.

The rhetoric of eastern Asia especially China, Korea and Japan and its studies formed their own tradition and showe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istory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individual rhetoric”, but it showed a new trend since 1990s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public rhetoric”.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different rhetorical tradi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vestigates the new rhetorical phenomena and its new challenges in eastern Asia especially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He thinks that “public rhetoric” is the trend of rhetorical communication and its studies of eastern Asia especially China, Kore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and multiple-media tim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connotation, forms and significance of “public rhetoric”, and also point out the developmental currents of rhetoric studies in eastern Asia.

“Public rhetoric” aims to deal with public policies, public interests and public affairs by gathering public opinions. The speakers of public rhetoric enjoy fair and free speech rights and democratic social system. “Individual rhetoric” mainly aims to deal with the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fates even though it induces the changes of public policies, public interests and public affairs. “Individual rhetoric” and “public rhetoric” are not only two forms of rhetorical phenomena, but also two traditions of rhetorical studies, two forms of culture, two forms of communicative system and social system. The currents of rhetoric studies in eastern Asia will develop from individual rhetoric to public rhetoric, from linguistic rhetoric to communicative rhetoric, from traditional media rhetoric to new media rhetoric,

from people rhetoric to national rhetoric and also from domestic rhetoric to international rhetoric.

Key Words : individual rhetoric; public rhetoric; eastern Asia; developmental current

투 고 일 : 2011. 5. 10. / 심 사 일 : 2011. 5. 20. ~ 2011.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6. 15.